

# 島嶼離返

台灣文學的戰時記憶與敘事再現

羅詩雲 著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CIP)資料

島嶼離返：台灣文學的戰時記憶與敘事再現 /  
羅詩雲著. -- 初版. -- 臺北市：國立政治大學政  
大出版社, 2025.02  
面；公分

ISBN 978-626-7615-08-9 (平裝)

1.CST: 臺灣文學史

863.09

114001821

## 島嶼離返： 台灣文學的戰時記憶與敘事再現

作 者 | 羅詩雲

發行人 李蔡彥  
發行所 國立政治大學政大出版社  
出版者 國立政治大學政大出版社  
總編輯 廖棟樑  
執行編輯 林淑禎  
地 址 11605臺北市文山區指南路二段64號  
電 話 886-2-82375669  
傳 真 886-2-82375663  
網 址 <http://nccupress.nccu.edu.tw>

經 銷 元照出版公司  
地 址 10047臺北市中正區館前路28號7樓  
網 址 <http://www.angle.com.tw>  
電 話 886-2-23756688  
傳 真 886-2-23318496  
郵撥帳號 19246890  
戶 名 元照出版有限公司

法律顧問 黃旭田律師  
電 話 886-2-23913808

初版一刷 2025年2月  
定 價 460元  
I S B N 9786267615089  
G P N 1011400218

政府出版品展售處

- 國家書店松江門市：104臺北市松江路209號1樓  
電話：886-2-25180207
- 五南文化廣場臺中總店：400臺中市中山路6號  
電話：886-4-22260330

**尊重著作權·請合法使用**

本書如有破損、缺頁或倒裝，請寄回更換

# 目次

導言	島嶼上的「戰爭」.....	1
	一、如何述說台灣？——以戰爭作為切口	3
	二、戰爭世代的記憶／技藝	8
	三、本書章節組成	24

## 第一部 日治台灣與帝國戰爭

第一章	戰爭與敘事調節： 論戰爭期前後石川達三與楊逵的 日人書寫.....	33
	一、帝國治理與派遣文學	33
	二、在筆部隊派遣之前：石川達三與楊逵的連結	39
	三、徵用文學的辯證：以石川達三《活著的兵士》與 楊逵〈增產之背後〉為論	48
	四、結語：從左翼到派遣	66
第二章	青春的創傷與修復： 論陳蕙貞《漂浪的小羊》與文心《泥路》 的戰爭記憶與成長敘事.....	69
	一、戰爭記憶所繫之處	69
	二、戰爭與成長：殖民國與被殖民地的兒少女性	74
	三、「家」的離返與對話：母系親族與不在場的父親	92
	四、結語：戰時記憶的自我修復與路徑探尋	101

## 第二部 復員重啟與社會內戰

第三章	擬聲政治： 論戰後初期《新臺灣》雜誌的女性修辭	107
	一、女聲與國族	107
	二、台灣省旅平同鄉會與《新臺灣》	112
	三、代言式書寫：戰後初期《新臺灣》的女性修辭	118
	四、結語：擬聲政治的性別操作	130
第四章	島嶼的離返： 戰後張我軍的歸返敘事與北京再現.....	135
	一、張我軍與中國	135
	二、迎來終戰：以台灣省旅平同鄉會與張我軍時論為考察	139
	三、身分與記憶的交涉重構：戰後張我軍的歸返書寫	149
	四、結語：以北京為緯的台灣鄉景	171

## 第三部 島外台人的述史敘事

第五章	漂泊者的中國風景： 台人音樂家柯政和戰前（1922-1945） 在北京的社會觀察與書寫 .....	177
	一、東亞離散的台人個案	177
	二、柯政和形象的報刊建構及其旅京網絡	181
	三、從千年古都到興亞基地：論柯政和《中國人的生活風景》 與《中國的社會風景》之社會觀察	195
	四、結語：民族風景的文化眷戀與生產	213
第六章	歷史記憶與創傷書寫： 論張光直《蕃薯人的故事》及其一九八〇 年代小說的再現機制 .....	217
	一、重返台灣的張光直	217

二、歷史記憶與創傷展演：《蕃薯人的故事》與戰後初期 小說、雜文	222
三、解構與重述：張光直一九八〇年代小說的創傷書寫	238
四、結語：歷史縱深中的自我探問	246
結 論 台灣戰爭記憶及其後 .....	249
一、戰爭遺緒與台人敘事圖式	251
二、戰時記憶的世代感	257
三、以文字直面戰爭	261
後記 .....	267
各章初刊出處 .....	269
參考文獻 .....	271

## 圖表目次

圖 1	〈中央公論を發禁「生きてゐる兵隊」等忌諱に觸る〉版面圖文（日本朝日新聞社提供）	50
圖 2	〈石川達三氏ら判決前審通り〉版面圖文（日本朝日新聞社提供）	50
圖 3	作家派遣地一覽表（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提供）	53
圖 4	《新臺灣》創刊號（國立臺灣文學館提供）	115
圖 5	〈音樂家 柯政和著作風行各地〉版面圖文	185
圖 6	前門大街	210
圖 7	故宮博物院	210
圖 8	街頭的外科醫生	210
圖 9	打水	210
圖 10	踩高蹺	210
圖 11	銀行整鈔員	210
圖 12	救濟院的寢室	210
圖 13	滿洲禮服貴婦	210
附表 1	《中國人の生活風景》、《中國の社會風景》目次與照片圖說	216



## 導言

# 島嶼上的「戰爭」

戰爭的存有無處不在，更與社會生活相互影響，甚或反轉自然秩序與社會價值觀，致使戰爭是探究近代人類歷史文化不可迴避的關鍵環節。若將台灣比喻為「房間」，由人類發動的戰爭恰如「房間裡的大象」般的複雜存在，其形體是如此明顯卻被人們選擇性的觀看、討論或詮釋。加諸戰爭推動台灣的歷史進程卻同時破壞了大眾生活，這種詭譎的特性讓人不禁對其保持距離卻又想一探究竟。加拿大歷史學者瑪格蕾特·麥克米蘭（Margaret MacMillan）指出世人活在一個戰爭形塑的世界，戰爭提供了政治興衰的機制、日常競技的形式、語言文字的隱喻，以及民族敘事的依據，言明戰爭與社會形塑的密切關係。<sup>1</sup> 2022年初的烏俄戰爭、2023年下半年以巴軍事衝突，以及2024年12月初韓國的短暫突襲戒嚴，再次向世人揭示戰爭在人類歷史發展從未遠離的真相，以及國際地緣政治深切影響戰爭發生和社會治理的事實。反觀十九世紀末葉以來的東亞地域，內外紛爭同樣不斷。作為東亞島鏈島嶼之一的台灣，其歷史進程亦實被接連不斷的戰爭所改變，近代台灣先後接受大清帝國、日本帝國乃至中華民國政府的政權治理，演化出重層與多元的殖

---

<sup>1</sup> 瑪格蕾特·麥克米蘭（Margaret MacMillan）著，曹嫻恆譯，〈前言〉，《戰爭：暴力、衝突與動盪如何形塑人類與社會》（台北：商周出版，2021），頁29-34。

民語境與身分意識。接連的戰爭讓台灣人面臨國境空間的變化、身分的複數轉換以及社會地域流動等狀況，這些流轉不定的闖境經驗持續浸染台灣人心智運作和社會機制的調節建構。

台灣在東亞歷史演進的巨輪中存續，當中最重要影響力量來自北國日本。1895年台灣成為日本海外第一個殖民地，催化日本邁向帝國之途，也促動（或言激化）台灣社會的文明進程與身分認同。社會學家紀登斯（Anthony Giddens）認為現代性是資本主義、工業主義、軍事權力與社會監控等四種制度叢結的共同作用。<sup>2</sup> 戰爭、資本向來與國家發展有關，當一九三〇年代日本陷於世界性政治經濟危機，為了擺脫內外交困的政經與階級鬥爭問題，轉而實行擴大對外的侵略戰爭與東亞擴張。<sup>3</sup> 殖民地台灣就此納入戰爭的資源掠取或協力範圍，成為東亞戰爭體系的一部分。戰局更促使台灣大眾形成大規模的人群跨區移動與社會再組織化，島嶼離返成為台灣的核心文化現象，涉及因戰爭錯位或重置人群之移動、記憶與書寫等層次。本書所言「離返」並非僅是地理移動上的意涵，因戰爭作動下的身分移轉、記憶浮動、敘事編組，其實皆與島嶼台灣的戰爭及其記憶產生張力關係，呈現緊密的相互牽引。因此，本書鎖定戰時記憶敘事或受戰爭遺緒作用之文學文本為研究主軸，梳理近百年來島嶼台灣所產出的離返故事和文化記憶。從文學角度觀看台灣的歷史和記憶，感知戰爭時期身處後方且歷經不同時代的作者，其作品的共相和殊相，為瞭解當代台灣社會提供一條獨特且有效的途徑。

---

2 Anthony Giddens, *The Consequences of Modernit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3 關於中日戰爭的分期，在日本學界存在「八年戰爭」和「十五年戰爭」兩種說法。前者認為中日戰爭應從1937年7月盧溝橋事件算起，截至1945年8月戰爭結束；一部分學者則認為中日戰爭應從1931年九一八事變算起。「十五年戰爭」的說法打破看似不連續的個別戰爭狀態。段瑞聰，〈日本有關中日戰爭研究之主要動向及其成果（2007-2012年）〉，《國史研究通訊》5（2013.12），頁87-88；鶴見俊輔著，邱振瑞譯，〈大亞細亞〉，《戰爭時期日本精神史 1931-1945年》（台北：馬可孛羅文化，2020），頁77-79。



## 一、如何述說台灣？——以戰爭作為切口

台灣面對的戰爭可謂結合了帝國軍事主義、國族主義和殖民主義的多重暴力，台灣意識崛起的過程亦牽涉到不同程度的戰爭事件。當中全面戰爭形態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影響台灣最深，當時東亞的主要戰場包括日本和美國的太平洋戰爭、日本和中國的日中戰爭，以及英、荷、法各殖民地的東南亞戰爭。一九四〇年代前後發生的二戰是各國根據總體戰理論所進行的全面戰爭，國家以各種強制手段介入社會與個人生活，於精神與物質上控制與動員民眾。<sup>4</sup>且因戰爭關乎了國族、主權，以及社會場域內的戰爭技藝與軍事治理，故戰爭的日常化發展是一理解近代東亞歷史與集體記憶的重要且亟待開發的角度。戰時台灣的民眾日常與戰爭前線後方的非日常磁場更是相互作用的，戰爭末期戰火、空襲的增加尤其使前線、後方的區別愈趨模糊，戰線後方情境成為另一戰場。

本書以戰爭作為切入點，探討台灣文學再現的戰爭歷史，考察戰爭經由文學書寫反映在記憶、身分意識、敘事策略和出版影響等方面的樣態。透過戰前、戰後世代的戰爭文學敘事，證明戰爭如何成為台灣文學表達的重要元素，又是如何呈現戰爭遺緒及其他社會化結果。基此，本書援用研究者汪宏倫以東亞的中國、日本、韓國、台灣為論的「戰爭之框」概念，探討戰爭如何形塑人們看待自己、社會或戰爭的方式，以及戰爭作用下構框（framing）過程的動態組成或鬆動。<sup>5</sup>戰爭之框的研究

---

4 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規模與特殊形態，改變了傳統軍事衝突原則、人們對歷史發展的想像及現代世界面貌。陳思宇，〈零年：現代世界誕生的時刻〉，收入伊恩·布魯瑪（Ian Buruma）著，白舜羽譯，《零年：1945年，現代世界的夢想與夢碎之路》（台北：紅桌文化，2017），頁11。

5 汪宏倫說明戰爭之框概念來源有二：一是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戰爭的框架》（*Frames of War*）對戰爭中的社會規範如何感知生命的認識論架構之文學比喻，生命價值並非先驗而是被建構的；二是社會學的「框架分析」傳統，概念主要源於厄文·高夫曼（Erving Goffman）的《框架分析》（*Frame Analysis*），高夫曼認為人們的日常活動使用或隱含了特定的詮釋框架，而這框架也非一成不變的存在。承前所述，且基於戰爭暴力對人類認知與社會結構的轉化、形塑，汪宏倫詮釋「戰爭

應用多為二戰、國共內戰的台灣情境討論，如藍適齊〈可悲傷性，「戰爭之框」與台籍戰犯〉一文從認識論角度出發，探討戰爭歷史書寫所映現的台灣社會規範，得證二戰記憶對戰後台灣社會國族認同的反作用力；李淑君〈「告密者」的「戰爭之框」〉立基於冷戰時期國共內戰的框架，得出「戰爭之框」在冷戰延續戰爭的局勢下既形構又扭曲告密者的認知，彰顯識框的的變動性。<sup>6</sup>前人研究證明戰爭之框是一種理解台灣的有效架構，而框架的選擇也相對表露主體的行動。最重要的是，戰爭識框並不隨戰爭結束而消失，而持續作用於社會或被制度化，或許會牽涉不只一個特定的戰爭。因此，戰爭之框也是一種戰爭遺緒的存在，衍生出戰爭記憶、歷史書寫及身分認同等問題；此外，戰爭之框的雙向構框特性，讓我們亦可於文學、戲劇、藝術等作品裡見其特殊的意義框架及其變化。

而戰爭對戰時社會又牽涉到「社會內戰」問題，不同個體或組織團體之間所蘊含的內在衝突狀態，具備價值信念或願景共享的主宰性取得，同時呈現與其他社會現象連結的問題面向。<sup>7</sup>值得注意的是，國家成長與政治權威雖關乎戰時社會和軍事前線的內外控管，社會文明或人民權利卻不盡然因戰爭的發生受到限縮，反而得到另闢空間的可能。

---

之框」的論證有兩層意涵：一是由戰爭所創造出的結構框架；二是關於人們對戰爭的認知框架，藉以賦予戰爭意義，加以詮釋、記憶。汪宏倫，〈東亞的戰爭之框與國族問題：對日本、中國、台灣的考察〉，收入汪宏倫編，《戰爭與社會：理論、歷史、主體經驗》（台北：聯經出版，2014），頁159-216。

- 6 藍適齊，〈可悲傷性，「戰爭之框」與台籍戰犯〉，收入汪宏倫編，《戰爭與社會：理論、歷史、主體經驗》，頁393-434；李淑君，〈「告密者」的「戰爭之框」：施明正、李喬、鄭清文、葉石濤筆下「告密者」的框架認知與滑動〉，《台灣文學學報》38（2021.6），頁35-76。
- 7 戰爭的研究視域除了戰爭、軍事本身，尚包括歷史變遷、人口流動、政治治理等宏觀社會現象，以及微觀層次的個人生命經驗、記憶與創傷等面向思考，另形成社會內部戰爭影響的討論。汪宏倫，〈導論 把戰爭帶回來！——重省戰爭、政治與現代社會的關聯〉，收入汪宏倫編，《戰爭與社會：理論、歷史、主體經驗》，頁9-13；汪宏倫，〈戰爭與社會：對「二戰結束七十週年」的觀察與反思〉，《國史研究通訊》10（2016.6），頁123-133。

例如一戰後女性地位的革命性變化，包括公民權的擴張與女性主義的論述。或以日治末期台灣志願兵徵募狀況而論，台灣人對志願兵制度的施行反應熱烈，掀起一股血書志願熱潮。<sup>8</sup> 因為此制度象徵被殖民的台灣人得到成為日本帝國軍人的資格，更意味著國民身分被肯認的意義。承前所述，戰爭創發的認知框架與社會場域內的戰爭技藝正是述說台灣故事的有效角度。若再以戰爭之框的概念扣連台灣文學向來關注的核心議題——人的主體性與身分意識之覺醒建構，則正可與戰爭之框所論的戰爭如何形塑人們認知的問題相互對話，即在「戰爭之框」的論述下記憶與身分如何主導了文學書寫。

記憶是自我經驗的結果，以社會因素作為框架而產出，呈現被歷史社會化的建制結果。敘事裡的記憶不會以純粹的狀態出現，而是混雜了認同、意識、敘事習慣或社會互動能力等因素，用來理解人的複雜行為和經驗。經歷、記憶和敘事是同步且相互關聯的，<sup>9</sup> 本書研究對象來自戰前、戰後世代，戰爭不約而同的成為他們敘事生產的共同主題，且皆受二戰戰事（尤其是太平洋戰事／大東亞戰爭）及其遺緒影響，致其敘事具有建構過往戰時經歷與回憶主體的雙重建構性。他們的書寫驗證作為人類社會恆常存在現象的戰爭，是形塑政治和社會結構的重要力量，也是近代台灣重要的集體記憶。同時歷史記憶與身分認同緊密關聯，更是國族建構的基石。然我們也必須謹記記憶是個多重分歧的概念，不僅指向對過往的建構，也指涉對當下和未來的協商與翻新。主體記憶在文學的文化生產中絕非純然為一種意識活動，而隱含政治、社會與文化意義。<sup>10</sup> 於是戰爭記憶的表述成為一種主體意識展演和敘事言說運作，且

8 周婉窈，〈日本在臺軍事動員與臺灣人的海外參戰經驗〉，《海行兮的年代：日本殖民統治末期臺灣史論集》（台北：允晨文化，2004），頁 142-150。

9 傑弗里·丘比特（Geoffrey Cubitt）著，王晨風譯，〈引言〉、〈記憶與個體〉，《歷史與記憶》（南京：譯林出版社，2021），頁 1-13、94-101。

10 李有成，〈記憶政治〉，《記憶政治》（高雄：中山大學人文研究中心，2020），頁 63。

其效應與書寫特性持續影響至戰後台灣文學的書寫表現。

在戰後台灣社會的文化脈絡中，記憶與遺忘反倒成為辯證國族的另類機制。<sup>11</sup> 在戰後台灣「去日本化」、「再中國化」的民族主義路線下，中華民國的政治體制自中國強力移植一種新主體（相對於台灣人而言），日治時期殖民地台灣的戰爭記憶轉化為民族抗日的集體記憶，部分記憶甚而隱諱不談。且過往戰時研究向來著重解析意識形態及國家前線層面，相對忽視被動員的人民與戰線後方現場。台灣社會史研究者洪郁如指出因為台灣二戰期間的殖民地境遇，以及戰爭體驗與記憶討論向來著重前線，戰後台灣社會記憶中存在去歷史化與歷史錯置現象，形成戰爭記憶的傳承危機。<sup>12</sup> 此外，汪宏倫省視戰爭、政治與現代社會的關聯時，特別提出歷史週期感與世代意識對刺激戰爭記憶論述與研究的作用。<sup>13</sup> 楊孟軒則從歷史記憶建構的牽連性，與間接性創傷、受害者意識等困境，闡釋台灣形塑共同社會記憶的不利因素。<sup>14</sup> 歷史週期感與世代意識也彰顯台灣關於戰爭記憶仍未有一致定見或充分討論，前者可得證於抗戰勝利週年或言終戰週年紀念活動的命名分歧；後者則見冷戰秩序瓦解後亞洲各國追求轉型正義的趨勢，以及台灣解嚴、戰爭經驗世代凋零狀況下，一九九〇年代以降各界搶救台籍日本兵歷史記憶的努力。<sup>15</sup> 具體成果除口述歷史和學術討論外，尚得見如陳千武小說《獵女

11 許俊雅透過戰後台人作家關於太平洋戰事的文學作品，強調記憶的書寫是一種解放，忘卻或失憶則相對表現一種被殖民強權奴役的狀態。許俊雅，〈記憶與認同——台灣小說的二戰經驗書寫〉，《台灣文學研究學報》2（2006.4），頁4-16。

12 洪郁如，〈臺灣空襲記憶在歷史傳承上的危機與契機：以戰爭兒童文學為中心〉，《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館刊》11（2016.5），頁36-45。

13 汪宏倫，〈導論 把戰爭帶回來！——重省戰爭、政治與現代社會的關聯〉，收入汪宏倫編，《戰爭與社會：理論、歷史、主體經驗》，頁5-7。

14 楊孟軒，〈歷史記憶與記憶的歷史：創傷、情感、牽連性與和解〉，收入許家馨編，《歷史記憶的倫理：從轉型正義到超克過去》（台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24），頁257-299。

15 藍適齊由日本、馬來西亞二戰紀念活動反思台灣歷史記憶問題，並指出一九九〇年代起學界重建部分台灣戰爭歷史記憶。藍適齊，〈在國族之外的歷史和解：「地域

犯》的中日文再版（1976 單篇小說，1984、1999、2023 中文小說集三版，2000、2008 日文選譯本）、劇本《南十字星》（2020）、音樂劇《熱帶天使》（2023）、電視劇《聽海湧》（2024）等各式文本的產出。<sup>16</sup> 任何戰爭歷史的記憶文本反映的都是「人」，基於歷史記憶的社會建制性格，得以連帶思考當前的生存情境、歷史詮釋、身分認同，折射出歷史記憶的重返與台灣國族意識息息相關。

二十世紀以降戰爭的歷史敘述與研究現況之錯置或忽視，以及世代意識與記憶論述的對話，仍是台灣社會亟待解決的問題。本書寫作的動機正是考量前述台灣戰爭記憶及歷史詮釋的分歧、錯置，將文學視為戰爭記憶傳承的實踐方式和考察場域。社會是戰爭的延續。島嶼上的「戰爭」之命題，不僅是論述戰爭與台灣社會交涉下文化與政治狀況，也將戰爭視為與台灣各種社會及文化相互指涉、依存的關係與過程。論

---

性》的二戰紀念活動與歷史記憶》，收入許家馨編，《歷史記憶的倫理：從轉型正義到超克過去》，頁 219-256。王惠珍認為解嚴後的後殖民主體重建讓台籍日本兵有了講述戰爭記憶與歷史敘事的位置。王惠珍，〈戰後在日台籍日本兵的戰爭記憶敘事——以磯村生得的相關文本為例〉，《台灣文學研究學報》37（2023.10），頁 16-19。李承機，〈作為方法的「日本時代」：「回憶錄」與「口述歷史」所製作的殖民地臺灣「歷史記憶」〉，收入李承機、李育霖主編，《「帝國」在臺灣 II：「日本時代」的歷史記憶》（台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20），頁 273-297。李承機認為九〇年代回憶錄、口述歷史的出版潮與台灣民主化和本土化時期重疊，各類政府機構是帶動此出版潮的主要力量，且文本主角由社會菁英延伸至擁有類似歷史經驗的人群之民眾化趨勢。

<sup>16</sup> 日譯本分別為保坂登志子，《『獵女犯：元台灣特別志願兵の追想』》（京都：洛西書院，2000）、丸川哲史，《『台灣人元日本兵の手記——小説集『生きて帰る』》（東京：明石書店，2008）。參見陳采玉，〈《獵女犯》的版本與日譯問題〉，《科學與人文研究》2：2（2013.12），頁 27-40。各式戰爭記憶文本的產出更交織出「書寫史學」與「影視史學」的問題，顯現語言、圖像和文字書寫之形式鼎立，豐富歷史的認知與傳達層次的討論。海登·懷特（Hayden White）著，周樑楷譯，〈書寫歷史與影視史學〉，《當代》88（1993.8），頁 10-17。《聽海湧》播映後的改編爭議，也顯現歷史記憶再現中史實與虛構創作的複雜關係。黃秀蘭主講，藍適齊、孫介珩與談，〈真實與虛構——時代戲劇創作與相關法律問題：以《聽海湧》為例〉，「2024『公視與您面對面』座談會會議紀錄」（公視數位內容部，周籽涵逐字稿文字整理）（來源：[https://info-material.pts.org.tw/sup\\_forum/sup2024\\_4\\_1009.pdf](https://info-material.pts.org.tw/sup_forum/sup2024_4_1009.pdf)，2024.11.18 檢索）。



述上，各章諸篇概以戰爭作為台灣主體建構的關鍵記憶及敘事刺點，由「記憶」與「遺忘」的敘事範式進行戰爭的詮釋，述說戰爭在台灣所呈現的生命故事與敘事組態。於此，形塑時間上戰爭之後與對戰爭進行批判反思的「後戰爭」(Post-war) 語境，於對戰爭可想像的通性之外，營構屬於台灣歷史文化發展的特殊性格。<sup>17</sup> 前文已述戰爭是理解現代台灣社會甚或是東亞社會的重要線索，本書則嘗試以文學研究路徑探究台灣歷史情境、記憶政治、身分認同諸類文化議題，析論島嶼的戰爭記憶及其敘事生產。

把握台灣歷史就應該研究戰爭。回到本書開篇的比喻，台灣這個「房間」與其內所存在的「大象」——戰爭的關係，仍必須透過房間的主人(台灣人)付諸行動解明。記憶從不只是自我經驗的複製重現，更加是藉以產製、聯繫群體共同經驗的意義符碼，牽涉群體的共同經驗。本書將戰時記憶敘事文本視為各世代主體的社會行動，各章所展開的文學文本論述就是解讀台灣的鑰匙，提供讀者諸君察覺戰爭樣貌與詮釋體系的路徑。

## 二、戰爭世代的記憶／技藝

### (一) 戰爭期歷史世代的現身

戰爭是人類特有的極端暴力活動，人類啟動、運作、記憶之，亦被其所影響。越南裔美國小說家阮越清(Viet Thanh Nguyen)在論著《一切未曾逝去：越南與戰爭記憶》(*Nothing Ever Dies: Vietnam and the Memory of War*) 陳述「所有戰爭都會打兩次，一次在戰場上，一次在記

<sup>17</sup> 一九七〇年代以降各種「後學」興起，「後戰爭」概念著重於戰爭遺緒和社會構框的問題，含納戰爭敘事再現乃至記憶戰爭的討論。梅家玲，〈後戰爭〉，收入史書美、梅家玲、廖朝陽、陳東升主編，《台灣理論關鍵詞》(台北：聯經出版，2019)，頁157-165。



憶裡。」<sup>18</sup> 這句話於深刻的記憶倫理上指明戰爭的記憶危機，避免遺忘之外，如何公正的記憶的這一步必須更謹慎商榷的邁出，於是我們必得回到人作為記憶主體的敘事問題上。「人」是戰爭遺緒的核心問題，也是行動與言說主體。戰爭對台灣社會的影響已不言而喻，但是戰局中的多數人，即大後方防衛群體或後人是如何回饋、省視、作動戰爭及其記憶，仍待我們超越國家的界線舉目考察，方能獲得公正的記憶。文字書寫是門運用符號、意義、象徵系統的美學技藝，讓書寫者跳脫框架建構和豐富自我的認識，而具自我實踐的主體意義。緣此，本書各章設定的研究對象鎖定於廣義的大後方防衛群體，探究台灣不同歷史世代書寫戰爭的自我技藝與記憶戰爭的多元軌跡。

世代差異常見於價值觀以及認知、行為方面，差異則來自時間的三個作用力影響：年齡、時期與世代，然而三者間卻不盡然能直接對應。<sup>19</sup> 「年齡」是生命歷程的發展軌跡，結合生理意義與社會期待的作用。如男女到了一定年紀必須成家立業的傳統價值，或者以十八歲作為完全責任的年齡劃限之社會性謬置現象；「時期」是指歷史事件所造成的某一時期影響，強調重要歷史事件對當時人們的影響。時期的作用特殊性是同時施加於同一歷史時空的人們，而對個人生命產生程度不一的影響，例如二二八事件對台灣各族群，或者是戰後初期台灣社會生活對本書研究對象陳蕙貞、張光直的相異影響；「世代」和年齡具有定義上的重疊性，指一群基於相似年齡經歷、共同歷史事件，而共享類似社會特質或共同經歷某種歷史經驗的人群。「世代」作為分析概念，涉及無法量化且只能體驗的人的主觀心靈時間以及社會歷史脈絡，指涉了一種

---

<sup>18</sup> 阮越清 (Viet Thanh Nguyen) 著，胡宗香譯，〈公正的記憶〉，《一切未曾逝去：越南與戰爭記憶》(台北：馬可孛羅文化，2022)，頁 34。

<sup>19</sup> 個人生命歷程是在社會結構脈絡中逐步建構，從而產生三種影響：年齡效果 (age effect)、時期效果 (period effect)、世代效果 (cohort effect)。Glenn, N. D. "Distinguishing Age, Period, and Cohort Effects," in J. T. Mortimer and M. J. Shanahan, eds, *Handbook of the Life Course* (Boston, MA: Springer, 2003), pp. 465-476.

特殊類型的社會位置。<sup>20</sup>換言之，「世代」這個觀念是具有彈性的，無絕對規律的周期劃分，且世代之間的互相影響亦不可避免。<sup>21</sup>例如台灣人的戰爭經驗就存有代際之別，即便同一世代的經驗亦非均質的存在。以本書而言，同屬戰前世代的柯政和、張我軍、楊逵與石川達三即因不同民族、認同或政治協力角色，而對日中戰爭、大東亞決戰存有相異認知與敘事意識。戰後世代的文心、陳蕙貞與張光直也因成長地域和家庭背景，對戰時台灣及二戰後復員生活擁有不同體驗。因此，本書所論之戰爭世代並非限縮於某一年齡區段的群體，而是指涉共同經驗過日本帝國戰爭或戰後台灣戰備之歷史時期所構成的後方知識群體，前述連續的戰爭情境正是本書所論對象——戰爭期歷史世代共同的時期烙印。

世代因素是人們共同社會行動的基礎，適足作為本書論述的依據。日治時期台灣知識分子的世代劃分說法紛紜，但多以年齡為必要考量條件之一，如周婉窈對「戰爭期世代」的定義指 1945 年終戰時年齡在 15 至 25 歲之間的台灣人，即出生於大正尾、昭和初的台灣人。<sup>22</sup>王惠珍則以語言教養為基準，劃分 1895 年前後出生的過渡世代、1910 年前後出生的日語世代、1925 年前後出生的跨語世代。<sup>23</sup>若林正丈的抗日運動史研究則將出身台灣總督府國語學校和醫學校且帶領一九二〇年代反殖民運動者，稱為「臺灣漢族第一代近代知識分子」（台灣漢族初代の近代知識人）。此台人世代多半擁有新式教育、海外經驗與殖民地社會運動參

20 蕭阿勤，〈導論〉，《回歸現實：台灣 1970 年代的戰後世代與文化政治變遷》（台北：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2008），頁 15-24。

21 馬克·布洛克（Marc Bloch），周婉窈譯，〈Chapter 4：歷史分析〉，《史家的技藝》（台北：遠流出版，2021），頁 215-217。

22 關於戰爭期世代與歷史世代的討論，參見周婉窈，〈「世代」概念和日本殖民統治時期臺灣史的研究（代序）〉，《海行兮的年代：日本殖民統治末期臺灣史論集》，頁 1-8。

23 王惠珍從 1895 年台人過渡世代的賴和、1910 年前後出生的日語世代、1925 年跨語世代的作家鍾肇政、陳千武論述各世代相異的戰爭經驗。王惠珍，〈戰後在日台籍日本兵的戰爭記憶敘事——以磯村生得的相關文本為例〉，《台灣文學研究學報》37，頁 16。

與等背景。<sup>24</sup> 其他非關年齡的說法，另見柳書琴由文化教養與社會環境等因素提出的「文化世代」概念。<sup>25</sup> 綜合考量社會氛圍、政經環境、文化教養等條件，本書採用日治前期一八九〇年代乃至一九三〇年代中葉此間出生、成長的台人為研究對象，這一世代從青春成長至生涯發展階段，始終置身近代東亞戰爭頻仍的歷史情境，外在環境與身分意識皆面臨極大的變動與壓抑，戰爭心理與政治動員已成為生活中的一部分。跨越終戰前後的他們，生命中疲於戰火空襲、疏散移動與物資管制的種種生活威脅，又受限於戰爭體制下政權嚴密的思想管控與各式動員；又，此群體所經歷的社會特質，先後因應一九四〇年代起整體戰局的嚴峻變化，以及戰後中國、台灣治理的權力壟斷和神話建構，戰時體制未曾遠離他們。特別是總體戰的臨戰氛圍與體制延續，促使他們不得不進入社會動員和身體戰鬥化的磨練，戰場知識的建構和操演成為揮之不去的生活負擔與世代創傷。<sup>26</sup>

這群大後方防衛群體敘事的研究意義，還在於歷史記憶研究對國族、個體之外記憶架構的重新發現，即過往被忽略的國族和個人夾縫之間小集團集體記憶的面向，以及既有戰爭研究論述中的邊緣角色。法國社會學家莫里斯·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論著《記憶的社會框架》（*Les cadres sociaux de la mémoire*），強調人們的記憶依附於有同樣

---

24 若林正文著，何義麟等譯，〈第一章 時代背景〉，《臺灣抗日運動史研究》（台北：大家，遠足文化，2020），頁41：「他們幾乎都是在日本領臺前後的十年之間出生的，這些人到達學齡時，剛好碰到日本殖民地教育的滲透期。公學校學生人數超越傳統的教育機關書房的學生數，是在1904年。思考到這一點，包含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在內，點燃1920年代臺灣抗日運動之火的知識分子，可以說是臺灣漢族的第一代近代知識分子。」

25 柳書琴，〈傳統文人及其衍生世代：臺灣漢文通俗文藝的發展與延異（1930-1941）〉，《臺灣史研究》14:2（2007.6），頁50：「『文化世代』並非年齡世代，而是由於教育系統、社會文化教養、道德價值氛圍、媒體／出版／閱讀形態、政治經濟環境，乃至主體文化認同等多重因素交互作用形成的『知識世代』。」

26 汪宏倫，〈武化的身體系譜（II）〉，收入汪宏倫編，《戰爭與社會：理論、歷史、主體經驗》，頁16-17。

共識的社會群體。由於社會存有無數個大大小小的群體，也存在著無數個銘刻於各世代單位的集體記憶。可謂集體記憶的存在乃依靠個人與國家之間無數個小規模集團（如家庭、朋友群、同一村落居民等）的記憶架構，個體可以依附這些小集團汲取記憶，於國家歷史記憶掌控的文化媒介中保存身體實作記憶。<sup>27</sup> 研究者李衣雲據此概念探討中國本位歷史與日治經驗之集體記憶於戰後台灣世代共同體記憶的變化，她以 2002 至 2003 年日本大眾文化相關業者的質化訪談為素材，析論一九八〇年代後台灣出現的日本形象已無生活於日本的實作經驗為基礎，而是一種具象徵意義的虛像；埃德加·波特（Edgar A. Porter）、冉瑩（Ran Ying Porter）合著之《被遺忘的人群》（*Japanese reflection on World War II and the American Occupation*）呈現助產士、學生、教師、少年工等日本平民的二戰歷史記憶，以採訪紀錄、口述歷史和未曾出版個人回憶文章為基礎，結合報刊資料，重新認識二戰對大眾的歷史意義。此作以戰爭相關次團體貫穿二戰歷史、歷史記憶和平民記憶三項主題，由下而上的提供小規模集團集體記憶的研究進路。歷史學者華樂瑞（Lori Watt）、林志宏的研究同樣提出二戰後方遺華日僑的戰爭記憶問題，牽引出戰爭下日本國民的邊緣處境、身分認同及遣返話語的問題。<sup>28</sup> 前述學者運用國家與個人之間小集團的記憶架構，展開歷史記憶的文史研究，除凸顯集體記憶不必然由國家建構，亦在記憶詮釋中保有對宏大敘事的批判辯證。

記憶的共同體是以「我群」為前提的集體凝聚基礎，但集體經驗中

27 莫里斯·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著，陳秀萍譯，〈確定回憶的定點〉，《記憶的社會框架》（台北：麥田出版社，2024），頁 313-330。

28 李衣雲，〈身體的記憶與義務的記憶：戰後台灣集體記憶的潛伏與再建構〉，收入李承機、李育霖主編，《「帝國」在臺灣 II：「日本時代」的歷史記憶》，頁 174-184；埃德加·波特（Edgar A. Porter）、冉瑩（Ran Ying Porter），《被遺忘的人群》（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21）；華樂瑞（Lori Watt）著，黃煜文譯，《當帝國回到家：戰後日本的遣返與重整》（台北：遠足文化，2018）；林志宏，〈兩個祖國的邊緣人：「遺華日僑」的戰爭、記憶與性別〉，《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24（2014.12），頁 1-45。

必然存在個體的差異性。而且不同社會的歷史文化脈絡也導致感情記憶產生落差，東亞的戰爭記憶便是明顯例子。<sup>29</sup> 那麼屬於台灣人的大後方群體記憶又是如何？以本書研究對象而言，作為戰時派遣作家的楊逵、決戰後方生活場域的平民陳蕙貞與文心、戰後復員時期國民身分曖昧的旅平台人、島嶼之外被戰爭陰影糾纏的文化人柯政和與張光直，這群人非屬戰爭前線要員，而是台灣戰爭及其遺緒問題的協力者和被害者的疊影化身，戰時的身分位置與文化記憶正主導了他們的後戰爭書寫，襯顯其視角對於戰爭歷史記憶的填補。戰爭記憶與敘事如何進行已在學界獲得相當討論，然而位置殊異的大後方集體記憶敘事的樣態，此部分仍待我們進一步統整解讀。哈布瓦赫對集體記憶的看法，包括各種集體記憶都有其對應的社會群體、集體記憶是一種仰賴團體成員個別記憶的社會行為、集體記憶是持續變動的，這些特性支撐了本書對戰時後方記憶敘事的研究意義。例如殖民地文學研究者朱惠足以宋澤萊、陳映真與目取真俊的二戰記憶書寫研究，演示了從個體身分位置考掘戰爭集體記憶的有效路徑。朱惠足分析台灣、沖繩作家各以「『曾經是，但現在已經不是』日本人」、「『現在仍是』日本人」的立場介入戰爭敘事，以及台灣、沖繩兩地戰後的歷史困境與身分議題，顯現東亞的國族戰爭敘事與記憶政治的挑戰意義。<sup>30</sup> 此篇研究回應從身分位置思考戰爭敘事的取徑，揭示集體記憶的變動性，並提醒文學文本探討必須回歸過去與當下寫作的歷史脈絡。

本書所論這一群非屬戰爭前線要員的人們，他們的書寫迴盪戰爭的過往痕跡，以文字陳述並回應台灣不同歷史階段的事件與論述。戰爭

<sup>29</sup> 東亞的感情記憶具有不相交集的「內部話語」特質，特別是日本人的感情記憶通常被東亞的其他地區簡化為支持和反對戰爭的抽象命題，加上仇日情緒的影響，戰爭記憶很難作為共通的歷史記憶以梳理戰爭責任。孫歌、黃光國、葉俊榮，〈東亞研究的省思〉，《臺灣東亞文明研究學刊》11:2 (2014.12)，頁 218-220。

<sup>30</sup> 朱惠足，〈從「戰爭的記憶」到「記憶的戰爭」：宋澤萊、陳映真與目取真俊的二戰記憶書寫〉，《文化研究》12 (2011.3)，頁 13-44。



作為台灣歷史和文學敘事歷久不衰的主題之一，本書將「戰爭」視為研究對象群體的共同經驗與文學寫作的敘事刺點，追索終戰前後台灣人不同世代或同一世代內殊異的戰爭記憶、敘事圖式與主體形構。文化符號學家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當代攝影論著《明室：攝影札記》（*La chambre claire: Note sur la photographie*）將照片的吸引力分為知面（*Studium*）與刺點（*Punctum*），刺點是照片所存且能觸發觀者產生強烈情感的偶然，是無法符碼化的偶然細節，宛如處於知識、文化、社會規範之外的無以名狀者，逼顯出攝影的現象本質。就刺點於現象學的討論，文本的伏筆、情節設置、藝術表達、主題揭示皆可視為一種「刺點」的存在，能用於文本分析，又可用作風格分析。<sup>31</sup>此外，刺點的詮釋也經常強調傷口、裂痕等創傷本質，適足以回應本書所論置身帝國戰爭與內部殖民語境中台灣人的戰爭記憶書寫。

台灣人的主體形成與戰爭的延續、遺緒息息相關，繫連日中戰爭、大東亞戰爭、國共內戰、世界冷戰等歷史記憶的建構與拆解。<sup>32</sup>除了進行當中的戰爭，尚須併同觀照戰後復員的歷史階段。二戰經驗與世界冷戰亦是台灣與世界接軌的重要經驗，戰爭帶來的不只是斷裂的負面遺產，還有連結、重組的積極意義。值得注意的是，戰爭的概念除了字面上的軍事衝突外，也包含資本分配、族群壓迫、文化控制等戰爭啟動的社會管理，戰爭狀態不單延續至終戰後，實乃時刻存於我們的日常生活之中。戰爭技藝與軍事治理在大眾生活場域內的施予，於是包含對「人」的建構生產。戰爭遺緒是一持續作用的文化現象，於戰火停歇後持續以不同形式滲入日常，更與歷史記憶和文化敘事相互作用。本書所

<sup>31</sup> 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著，許綺玲譯，《明室：攝影札記》（台北：時報出版，2024）；萬胥亭，〈從羅蘭巴特《明室》的「現代私密主體」看安東尼奧尼的《春光乍洩》〉，《中央大學人文學報》38（2009.4），頁75-81；周郁齡，〈符號學到現象學轉向——朝向攝影本體的閱讀行為〉，《藝術論壇》3（2005.5），頁187-191。

<sup>32</sup> 戰後台灣民主化的過程實是對中日戰爭與國共內戰之戰爭識框的同時拆解。汪宏倫，〈東亞的戰爭之框與國族問題：對日本、中國、台灣的考察〉，收入汪宏倫編，《戰爭與社會：理論、歷史、主體經驗》，頁202-206。



論作家群的創作活動與出版發表，是戰爭的紀錄、記憶和反思，形塑時間上戰爭其後與對戰爭進行批判反思的「後戰爭」語境。<sup>33</sup> 戰爭與政治暴力對生命禁錮與秩序重建的運作，深刻影響此間大眾的生命際遇與記憶書寫，鬆動且重構了認同結構與歸屬位置。此外，私人身體與情感結構的實踐樣態也被重新塑造，而促發戰爭遺緒作用之傷痕見證與美學回應。

二戰促發了東亞秩序、國家邊界與政治主權的重劃。在中國所稱的抗日戰爭或者台灣所知的日支事變、大東亞戰爭，皆令戰線後方普遍經歷戰火流亡、防空疏散與物力徵用的身心苦痛，戰爭打破所有的界線。就全球而言，二戰是現代世界形成的關鍵時刻，不僅是地緣政治輪廓，同時也構成國族自信的精神指標。<sup>34</sup> 就台灣而言，第一島鏈的地理位置和多重殖民歷史，「戰爭」成為台灣無法迴避的歷史發展動力，促進台灣存有各種人群的遷移和認同形成的多元路徑。台灣的特殊背景觸發了本書研究關懷——台灣的「戰爭期歷史世代」對戰爭記憶的陳述與其主體樣態。本書所論之「戰爭世代」或多或少歷經了自乙未戰爭、滿洲事變、日中戰爭、大東亞戰爭、國共內戰乃至國府 1949 年遷台後治理的社會戰備狀態，此世代身處連續且非關己身的戰役之中。敘事考察由一九三〇年代末葉日本帝國戰爭論起，本是考量此戰為全球性戰爭的一部分，也是引發戰後國共分治的前行歷史背景，累積且生發出當時大眾不同的路程記憶與身分轉換。

若以「世代單位」概念對照台灣戰爭記憶的記憶構框集團，可想見存有高砂義勇隊、台籍志願兵、海軍少年工、慰安婦、監視員與通譯等

---

<sup>33</sup> 戰爭遺緒是在空間或日常生活中，因戰爭所衍生或未完之種種生命樣態，以創傷經驗、身分認同、意識形態或話語形構等形式施予個人生命的規訓，而轉化為另類的戰爭樣態。梅家玲，〈後戰爭〉，收入史書美、梅家玲、廖朝陽、陳東升主編，《台灣理論關鍵詞》，頁 159-160。

<sup>34</sup> 方德萬 (Hans van de Ven) 著，何啟仁譯，〈導論〉，《戰火中國 1937-1952：流轉的勝利與悲劇，近代新中國的內爆與崛起》(台北：聯經出版，2020)，頁 37。

國家與個人之間的次要集團。這些群體隱身於戰爭日常的社會場域中，再現於戰後語境中，甚至直接現身於一九九〇年代以降的台灣回憶錄和口述歷史之出版浪潮。這種戰後登場的現象驗證集體記憶的本質雖是一種社會性建構，卻不必然是國家所建構的，戰爭記憶的敘事主體尤其多元複雜。因此，世代概念的使用有助於釐清戰時社會變遷與歷史發展究竟對台灣文學的敘事造成何種質變，戰前和戰後世代之間又有何敘事異同。

若以 1945 年終戰時點為判準，本書所論包括戰前世代的楊逵、石川達三、張我軍、柯政和與旅平台人社群，以及戰後世代的陳蕙貞、文心、張光直之兩大類戰爭體驗世代。<sup>35</sup> 這群人皆曾生活於日本帝國勢力環境下，分別或接續面對大東亞戰爭與戰後社會內戰之敵我區辨識框。寫作身分涵蓋文學家、音樂家、教育者、社會運動者、在學學生，皆是帝國戰爭及其遺緒問題的直接被影響者與書寫者。第一部「日治台灣與帝國戰爭」以楊逵、石川達三／陳蕙貞、文心為對照組，於帝國戰爭中考察官方派遣作家和後方防線大眾的戰時記憶與敘事圖式異同，第一部的作家們都因為戰爭進行地理移動。第二部「復員重啟與社會內戰」聚焦島外台人社群雜誌《新臺灣》與其代表文人張我軍，整合析論戰後社會內戰漩渦下台人的認同轉折與敘事修辭。第二部的敘事核心其實是台人在身分上復歸中國，和遣返故鄉台灣的雙重離返歷程。第三部「島外台人的述史敘事」採柯政和、張光直為個案，論述兩人屬性相似的歷史敘事寫作，挖掘其與島嶼一離一返的認同意識對照。本書個案的活動與書寫正凸顯後方的台人戰爭記憶與代際經驗之別，以及同一世代戰爭記

<sup>35</sup> 歷史社會學者福間良明將日本的戰爭體驗者分為戰前、戰中、戰後、戰無世代四群，劃分依據為教養歷程與戰爭體驗。「戰前世代」指日本敗戰時三十歲左右，於戰時氛圍籠罩之前度過青春期，此世代之知識分子多受過自由主義或馬克思主義洗禮。「戰後世代」為終戰時十歲左右，其戰爭經驗多為空襲經驗與疏開經驗。福間良明，《「戦争体験」の戦後史：世代・教養・イデオロギー》（東京：中央公論新社，2009）。

憶敘事的非均質構框狀況。

## (二) 台灣戰爭認識的文學系譜

國家是貫穿時間而存在的有機體，啟動了戰爭，卻也被戰爭所形塑。歷史上的戰爭透過權力的動員佈署延伸其作用至社會內裡，即便戰爭結束後戰時價值觀及組織形態、文化影響仍會續留，或見於政治治理、公民運動、文字書寫、歷史記憶等運作機制上。與此同時，台灣國族的形構則因政權、世局的內外變動而充滿斷裂，致使戰爭遺緒與國族身分轉換之間產生矛盾衝撞。此狀況由日治記憶在戰後台灣內部的失落、壓抑與再現，及其對台灣認同意義的階段變化便一目了然。<sup>36</sup> 戰爭遺緒與國族身分為近代台灣社會的重要議題，再加上政治意識、身分劃分、歷史視角與敘事介面的多元，致使兩者彼此相纏且互為作用至今。本書主要以大東亞戰爭及其遺緒作為研究問題的思考基底，設定「日治台灣與帝國戰爭」、「復員重啟與社會內戰」、「島外台人的述史敘事」三個主題梳理台人戰爭書寫。第一、二部主要處理小說和散文隨筆的文學文本，第三部則是鎖定回憶錄、文化論著之文本素材，回應歷史再現議題，三部主軸概從台灣出發以展開戰爭及其相關記憶書寫的系列討論。

歷史學家成田龍一從戰後日本的戰爭認識系譜，論述戰爭經驗是體驗、證言、記憶三種歷史性形態織構的集合體，認識論考察的是由戰後回視戰爭的動態歷程。他認為一九五〇年代日本主要是「體驗」的時代，戰爭經驗者講述自我的戰爭經驗。一九七〇年代是「證言」的時代，將戰爭體驗放在證言的位置予以客觀化陳述。王惠珍認為戰後台灣

---

<sup>36</sup> 戰後台灣對日治時期記憶的態度，可見一九五〇、六〇年代國民黨政府藉壓抑日治記憶成為中國認同的基礎，七〇年代日治記憶隨鄉土回歸浪潮和抗日論述而出土，八〇年代以降日治記憶逐漸被視作台灣認同的一部分，二十一世紀日治歷史記憶書寫則獲得蓬勃發展。劉亮雅，〈導論 後殖民與日本記憶〉，《後殖民與日治記憶：二十一世紀台灣小說》（台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20），頁 9-15。

因語言轉換與政治氛圍實缺乏此類證言認識論的建構，我們也由此得見戰爭識框在戰後台灣的矛盾。一九九〇年則開啟「記憶」的時代，追求戰爭的歷史化而非真實，記憶是被建構的。成田龍一主張體驗、證言、記憶在戰後日本的戰爭認識系譜中，會隨著時間、世代的變化而產生比重差異，並指出日本戰爭認識缺乏對殖民地的討論。<sup>37</sup>

成田龍一的梳理不僅反映了戰爭識框的持續變動，同時襯顯本書以殖民地台人戰時經驗出發的研究價值，再來是提醒我們一九九〇年代以來戰爭記憶現身於台灣回憶錄和口述歷史的文化現象，凋零的不只是戰爭歷史世代的生命，還有隨之逝去的戰爭體驗第一線記憶。第一章的兩篇小論〈戰爭與敘事調節：論戰爭期前後石川達三與楊逵的日人書寫〉、〈青春創傷與修復：論陳蕙貞《漂浪的小羊》與文心《泥路》的戰爭記憶與成長敘事〉便是探究戰爭世代體驗的第一線記憶與寫作技藝。左翼寫實出身的普羅作家石川達三和楊逵，戰時以筆部隊的協力身分體驗所謂戰爭現場（南京戰線、石底煤礦），他們適應了官方國策的創作姿態，延續一九三〇年代的集團寫實手法，於不直接違逆當局的路線中記錄戰爭人性實相，以文學之筆留下真實觀察。戰後世代的陳蕙貞與文心（許炳成）則到達戰時社會大眾的疏散邊境、後方生活，刻劃台人兒少在日本、台灣的空襲疏散、勤勞奉仕之日常，傾訴決戰時空遺留的歷史創傷與個體離散的鄉愁。

第二部鎖定戰後初期台灣至一九五〇年代的台人身分問題與敘事修辭，考掘 1945 年終戰後戰爭遺緒與國族身分的糾結歷程，屬於戰時經驗者以文字留下時代見證的討論。處身 1945 年終戰座標上的台灣知識分子，其書寫由兩條矛盾的軸線所影響，其一為曖昧的身分認同，其二為強烈的時代焦慮。面對進退失據的身分困境，父系家族比喻成為國族

<sup>37</sup> 成田龍一，《增補「戰爭經驗」の戦後史 語られた体験／証言／記憶》（東京：岩波書店，2020）；王惠珍，〈戰後在日台籍日本兵的戰爭記憶敘事——以磯村生得的相關文本為例〉，《台灣文學研究學報》37，頁 19。

集體想像的自我守護論述。戰前旅居中國多年的張我軍深感日本帝國主義與中國軍閥官僚對主體的脅迫，他以極高期待迎接終戰，但日本、中國戰爭識框的矛盾讓台灣人只得獲得延遲的身分認同和差別待遇。被政府遺棄的失落情結打擊了張我軍的中國認同，只能借道昔日的北京記憶重新向原鄉台灣尋找歸屬；第三部則於戰爭遺緒與國族身分的矛盾背景上，析論台人再現歷史記憶以調解前述矛盾的敘事個案，包括島外漂泊台人柯政和的文化論述與張光直的記憶敘事之例，分別觸及大東亞戰爭與國共內戰的識框影響。柯政和一九四〇年代出版的中國文化論著，演繹了一個相對極端的做法。旅居北京的他全然迴避台灣強力訴說中國社會風景，由大東亞文化建設的戰時視域，表現日本帝國權力、中國社會文化與東亞民族統合的思想力場。長期旅居海外的張光直則在九〇年代末葉出版口述回憶錄，考古戰後的自我記憶與歷史，統合中華民國史和日本殖民統治史的政治識框，以個人生命史追溯戰後初期台灣國族建構的衝突歷史。

戰爭記憶及其遺緒提供族群認同的基礎，然而即便是同一場戰爭也因所處政經環境與意識形態不同而具相異意義，如日中戰爭或抗日戰爭、大東亞戰爭或太平洋戰爭命名之別，顯現記憶詮釋的民族倫理立場，也是戰爭之框的轉換。除了民族、政治、意識形態因素，本書更著意於文本分析的回歸，探索每個世代是如何書寫戰爭、記憶戰爭、詮釋戰爭的認識論。這不光是從戰爭遺緒影響的面向出發，還包括記憶主體如何進行或改變戰爭遺緒的話語形構。無論是小說、回憶錄或論述的體裁，都存在寫作者自身的價值詮釋與關懷所在。任一戰爭世代關切的對象與其說是戰爭前線的作戰情勢，更加是戰爭中廣泛存在且包含己身的大眾生活。其範疇涵蓋了公眾社會的經濟、文化、政治結構，以及私人個體的認知識框、心理情緒，顯示戰爭遺緒糾結而生的各式問題與動態認識。戰爭時期的前線軍事作戰和動員已不足以解釋戰爭的整體樣貌，社會內部階層和個體生存競爭牽涉的社會層次戰爭，即戰時「人」的鍛造生產更為本書投以關注的問題。許俊雅指出台灣文學小說把「人」作



為價值尺度審視戰爭的表現，大約始於一九六〇年代，九〇年代前的戰爭經驗書寫則散布於反共懷鄉、反殖民、皇民文學等文類。<sup>38</sup>但在本書的討論脈絡中，戰爭認識並不必然由作戰經驗者才能陳述，相關書寫更可見於前述文本之外的文類。因為台灣所面對的總力戰體制，令全民成為戰爭動員的對象，所謂的作戰經驗必得重新定義，戰爭記憶也須重新劃定。

戰爭牽涉範疇廣泛，解釋戰爭從來不是件簡單的事。然而台灣的現代化過程離不開戰爭和國族打造的歷程，如何陳述戰爭經驗與記憶成為戰後台灣社會文化與身分認同研究的重要參照。而且文學藝術與戰爭之間往往是互相作用的，藝術甚至是動員手段之一，立場表態也常流動不定。<sup>39</sup>一如石川達三、楊逵打著派遣作家的名義，受命寫作戰爭協力的小說，卻偏移焦點消極詮釋戰爭，招致筆禍或違逆國策的解讀空間。因此，文學藝術對記憶保存（或言詮釋）至為關鍵，它是戰爭體驗的記憶和證言形式，亦幫助我們瞭解當時的人怎樣處理、記憶與敘說戰爭，補充歷史典籍與官方文書未見、未述之處，表現人類對戰爭的想像認識與價值理念。至於如何接近台灣戰爭記憶的問題，非虛構寫作則提供了一個以文學佈局回到現場的方式，同時能表現撰述者對當代社會的意識。2017年出版的《終戰那一天：台灣戰爭世代的故事》是結合史料、學術論文與文學筆觸的「創意性非虛構寫作」(Creative Non-Fiction)。<sup>40</sup>此書運用文學的實驗表述來詮釋戰時經驗者的心境，試圖呈現戰時體制下「前線」、「後方」、「外圍」三種視角的人物群像，實則是記憶傳衍與戰爭認識的意識發揮，對應了如何記憶的問題層次。《終戰那一天》在個人記憶與家國敘事的具體知識或事件基礎上，縫補戰時後方大眾精神

38 許俊雅，〈記憶與認同——台灣小說的二戰經驗書寫〉，《台灣文學研究學報》2，頁60-61。

39 瑪格蕾特·麥克米蘭(Margaret MacMillan)著，曹嫻恆譯，〈戰爭與藝術〉，《戰爭：暴力、衝突與動盪如何形塑人類與社會》，頁373-380。

40 蘇碩斌等著，《終戰那一天：台灣戰爭世代的故事》(台北：衛城出版，2017)。



史於台灣社會遺落的空白，既傳達了個人戰爭經驗與思索，亦表述了前線、後方戰爭體驗者共同的心靈。

台灣人的戰時後方經驗，一如研究者洪郁如所論是充滿空白、恐懼的印象與去歷史化的問題。<sup>41</sup> 社會生活的戰爭現象或許能藉由史料文獻呈現物資配給、軍事動員與防空避難的規範制度，但生活其間的人群心理狀態與認知感受，仍需藉由文學文本的敘事予以呈現。非虛構寫作結合了文獻史料和當代視域，雖能為過去的戰爭世代發聲，呈現當下台灣社會對記憶建構的詮釋觀點，卻也摻雜後設重構的寫作縫隙。有鑑於此，文學原典的文本分析對戰爭記憶的存續與建構，是戰爭認識體系之必要工作。文本分析除了助益戰時記憶的保存與意義詮釋，更重要的是，文學裡的戰爭經驗連結了終戰前後台灣文學的敘事研究主題，架構一個跨越時間斷代的文學史發展脈絡。研究者黃美娥回顧台灣文學的研究趨向，發現作家作品論的基礎研究之外，學界慣常援引西方文學、文化理論以擴大台灣文學詮釋框架的傾向。<sup>42</sup> 然而除了耳熟能詳的後殖民、現代性、比較研究，與近年在台灣崛起的華語語系論述，「戰爭認識」的概念或許能提供一個擴充台灣文學研究邊際與國際連結的可行方向。

當前東亞區域存在的歷史認識問題，幾乎都與戰爭遺緒有關。顏元叔〈台灣小說裡的日本經驗〉早已點明太平洋戰爭造成台灣人最深刻的苦痛經驗，由台日關係開展台灣小說戰爭敘事的討論。<sup>43</sup> 本書主軸背景由大東亞決戰識框和去殖民化論述所交織，兩者激發的身分意識又往往疊加國際關係的作用力，台灣由戰前抵抗英美的東洋論被挪放在戰後

41 洪郁如從空襲論述展開觀察，發現空襲記憶在台灣浮現偶然性與去歷史化問題。面對此台人戰爭記憶的傳承危機，歷史學界展開以各式口述訪談計畫的主軸行動。洪郁如，〈臺灣空襲記憶在歷史傳承上的危機與契機：以戰爭兒童文學為中心〉，《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館刊》11，頁 36-45。

42 黃美娥，〈台灣文學研究的回顧與展望〉，耿立群主編，《深耕茁壯——台灣漢學四十回顧與展望》（台北：國家圖書館，2021），頁 235-240。

43 顏元叔，〈台灣小說裡的日本經驗〉，《中外文學》2:2（1973.7），頁 106-121。

抗俄反共的東亞動員體系，持續為非關台灣主體的問題而戰。所謂台灣的「歷史認識」其實就是「戰爭認識」的問題。<sup>44</sup>「戰爭認識」泛指各種行為者對戰爭的認知、感受與意義詮釋，與汪宏倫提出的人們對戰爭認知框架的「戰爭之框」意義有所疊合，但其差異在於更強調行為者本身的經驗、意念與識框作動的能動性。台灣文學的戰爭敘事寫作者仍多親具戰爭體驗，其書寫經常與政治爭辯及成長教養有所連動，如赴中國求學的張我軍和旅日工讀的楊逵各從民族文化和無產工農視角因應戰時情境。台灣關於 1945 年前後的戰役（日中戰爭／大東亞戰爭／國共內戰）之經驗與認識層面亦顯多樣，參與角色、戰爭場域、社會歷史階段無法分立而論。其囊括敵我、性別、族群、省籍、階級等參與者角色，前後方、島內外、軍種等不同場域，以及戰爭初期、決戰期、準戰備、後勤復員等階段。若具體以前線與後方的場域概念進行類型劃分，前線戰爭經驗則交織角色之屬的士兵、軍屬、看護婦，及文化筆部隊等類別的戰場經歷；而後方的戰爭經驗則又涵蓋精神動員、軍事徵用和社會控制等不同階段的日常生活樣態。

戰爭本身雖能宣告終結，但其文化影響卻從未結束，從軍事場域、社會生活到符號象徵等大小場域都見痕跡。關於對戰爭的認知與詮釋，實則是放在宏觀的歷史認識脈絡中理解。由日治時期渡越至戰後台灣，此間是探討「殖民地台灣」轉換至「民國台灣」過程中接軌抑或脫軌的關鍵時段。研究者黃金麟指出 1945 年二戰的結束只是終結國與國的衝突，中國國內的階級戰爭與接管台灣後的國民轉化，仍於社會大眾的精神意識與肉體上持續進行「戰爭」。<sup>45</sup> 可以說本書所論對象始終處於戰爭

44 張隆志，〈戰爭記憶、認同政治與公共歷史：從當代東亞歷史教科書問題談起〉，《國史研究通訊》10（2016.6），頁 114-115。

45 黃金麟由戰爭與國家體制建立、社會軍事化的角度，從近代中國和日本操作戰爭的方法，討論軍事治理、身體與現代性的緊密關係。黃金麟，《戰爭、身體、現代性：近代台灣的軍事治理與身體 1895-2005》（台北：聯經出版，2009），頁 108-120。

或準戰爭情境，先後歷經國族戰爭、殖民統治、戰時體制和國民黨遷台後治理的歷史。這群戰爭認識的行為者並非均質的群體存在，他們的文學創作或口述歷史成為台灣戰爭記憶之所繫，互為補充，也是觀察近代東亞各關鍵戰役下後方大眾識框的素材。尤其文學寫作讓被壓抑的經驗透過知覺架構與記憶組織獲得情節描述，推動了敘事主體追尋生命意義和形塑戰爭認識。故由戰爭歷史世代的文字，或以其他表述方式所想像、重述或壓抑的文化記憶切入，可以一窺重重抑鬱、詭譎多變的台灣戰時圖景，以及置身其中的行為者的外在生存境遇與內在精神狀態之演化。

文學閱讀向來必須觀照歷史情境的詮釋，一是內容時空，一是寫作時空。意義建構自然無法脫離作者的、故事的以及讀者的三種情境交涉結構。世代與歷史環境及共同意識的形成具有相當程度關聯，意即當我們閱讀戰爭期歷史世代不均質的個體故事時，必得同時考量其戰爭涉入經驗的不一和受眾的相異背景。戰爭期世代敘事的討論從來不只呈現對上一代歷史經驗的反思，也表達融合現時生活的主體文化視域。如同記憶的形構必然與他者關聯，所以世代歷史記憶的討論並非僅是個人敘事內部的單向討論，亦涉及敘事與外在語境的交會。我們必須體認世代價值與認同會受過去所支配，社會必然存有多元或矛盾的歷史記憶。文學與戰爭的關係並不獨特，但對歷經多次非關己身主權戰役的近代台灣而言，戰爭記憶及其敘事的討論是項需要持續進行的志業。此課題一則揭示身為戰爭受害者的隱藏力量，於戰爭倫理的位置上擁有戰爭之後文字象徵的發言權。二是顯明戰爭對台灣文明進程與國族意識組構的作用全景，包括政治籌謀、國際關係和後方情感、意識網絡的同謀體制。

本書由文學文本的分析方式出發，便是設定作家對於戰爭的理解與陳述，是與政治家或軍事家的邊際思考完全不同。作家倚靠自我和世代經驗、想像或者創作而描寫過去的戰爭，以文字揭露或重述記憶內質所無法名狀的情感、意念或認知，從而向外傳遞、分享並得與外界整合反饋。就本書研究對象而言，台灣意識是其運作戰爭遺緒的敘事要件，正

因為對台灣土地、身分、文化或生活經驗的有效感知，才能讓他們持續書寫島嶼上戰爭的記憶故事。正面迎接、迂迴應對或否認靜默皆是一種表態，即便是在文化論著中隻字未提台灣的知識菁英柯政和，他的噤聲其實也意味著積極迴避台灣的深刻意識。基於敏銳的時代感知與政治意識，殖民地知識分子柯政和冒籍掩其出身背景，化身為中國民族的代言人，將目光望向消逝中的中國文化。柯氏的態度與民俗著述何嘗不是大東亞戰爭識框下政治效應和文化意識的延伸，呈現抵抗英美的東洋民族統合書寫。當我們閱讀這些由戰爭記憶衍生的書寫，追索過去的歷史記憶之際，也是與諸篇寫作者一同經歷戰爭最深層的苦痛，即軍事主義體制下全民的同謀性。<sup>46</sup> 每位敘事者的戰爭經驗畢竟只是整體戰爭經驗中的一小部分，但能寫下並流傳於世，又有機緣為我們閱讀的已是少數中的少數。我們應該珍視並審慎思辨戰爭期歷史世代的敘事，因為書寫戰爭既存在著記憶再現的美學、倫理與身分之多重挑戰，也是島嶼台灣本土脈絡產製的社會記憶核心。

### 三、本書章節組成

社會基礎是人認識事物的方式，社會變遷會引導我們注視或忽視一件事，「戰爭」便是一個這樣的存在。牽動島嶼台灣的戰爭不純然是一種歷史情境，而是一個認識台灣的方式。台灣甚至是整個東亞國族問題概與戰爭遺緒連動，戰爭儼然是當前東亞共同的核心歷史記憶。本書嘗試析理台灣文學的戰爭記憶敘事，以此為焦點觀照東亞情勢，組織台灣的戰爭認識體系與其敘事圖式。全書章節構成分為三部六章：分別為「日治台灣與帝國戰爭」、「復員重啟與社會內戰」、「島外台人的述史敘

<sup>46</sup> 戰爭機器是一個無所不在的同謀體制，結合了前線、後方的支持網絡，全面戰爭讓每個人都必須付出戰爭成本。阮越清 (Viet Thanh Nguyen) 著，胡宗香譯，〈真實戰爭故事〉，《一切未曾逝去：越南與戰爭記憶》，頁 278-281。

事」三個單元，各收錄兩篇論述。架構大致依據各篇研究對象的活動時序而安排，由一九三〇年代末葉以降日本帝國於東亞場域發動的戰爭論起，及其社會內戰之遺緒問題。考量個人生活經驗與社會認同的互動性表現，且文本出版流傳後同樣藉由「敘事」成為社會記憶的一部分。<sup>47</sup> 研究素材除了小說、散文、隨筆文學作品外，尚包括作家回憶錄與文化論述等文本。各章議題具體包括戰時派遣文學、決戰空襲疏散經驗、戰後復員台人身份論述、戰爭文化記憶等課題，呈現日治時期乃至一九九〇年代台灣文學的戰時記憶與敘事再現。

**第一部「日治台灣與帝國戰爭」**包括第一、二章，主要處理的是關於殖民地台灣於日本殖民帝國大東亞決戰下的小說敘事表現與戰爭記憶，包括戰爭進行中的戰時書寫和戰後回首建構戰爭歷史記憶的文學文本研究。由此兩章一則得見戰時文學書寫對人類生存環境和人性演繹的寫實用筆，二則為台人對戰爭後方記憶的歷史詮釋與成長創傷。兩章亦可內部比對戰前與戰後寫作背景、戰線與後方場域，以及不同世代的敘事策略與台灣記憶。第一部實是對戰前、戰後世代的戰時體驗與記憶詮釋的考察，共同觸及戰時記憶敘事再現的寫作技藝問題。

第一章〈戰爭與敘事調節：論戰爭期前後石川達三與楊逵的日人書寫〉是台日作家的比較研究。一九三〇年代的日本帝國於亞洲地區發動侵略戰爭，藉以擺脫國內政經各層面的困境。與此同時，隨戰爭範圍的持續擴大，日本帝國次第的對諸殖民地作家加強統制與發動文化協力運動。尤其至三〇年代末葉，內地日本、殖民地台灣、朝鮮的文化人無一不被當局動員以筆桿宣傳聖戰。日本文化筆部隊的一員石川達三，其戰地派遣的報導文學之作《活著的兵士》（《生きてゐる兵隊》），卻因過度暴露戰爭負面印象而遭查禁，為當時文學者戰爭協力的圖像添上異色；台灣方面，1944年6月總督府情報部的策劃之下，台灣文學奉公會選

47 王明珂，〈誰的歷史：自傳、傳記與口述歷史的社會記憶本質〉，《思與言》34:3 (1996.9)，頁149-150。



派台、日作家至台灣各生產現場考察，據其實地體驗描繪「產業戰士」之姿。其中楊逵徵用之作〈增產之背後〉（〈増産の蔭に〉）所呈現的殖民主義加諸個人意識的暴力，亦具是否悖逆國策論述修辭的爭議；承此背景，第一章就日本帝國戰爭時期（1937-1945）的文學為討論主軸，從一九三〇年代石川達三與楊逵、殖民地台灣的文學連結，接續比對戰時派遣文學的寫作表達。論述架構分為兩部分；其一爬梳石川達三在三〇年代台灣文壇的受容與評價，並比較石川達三與楊逵關於日人移工的書寫文本；其二討論兩人戰時文學呈示之生存環境和人性演繹筆法。從而平衡瞭解帝國文化語境下台灣、日本左翼作家於戰時前後的敘事調節與左翼關懷的意識轉化。

第二章〈青春的創傷與修復：論陳蕙貞《漂浪的小羊》與文心《泥路》的戰爭記憶與成長敘事〉，陳蕙貞《漂浪的小羊》（1946）與文心《泥路》（1968）同以兒少為小說主角，於二戰時空扣合青少年的成長與啟蒙議題，卻各自組構殖民母國日本、殖民地台灣的戰時景象與家族記述。其敘事者與故事背景形成鮮明對比，且折射出作者傳記文本、經驗記憶與社會認同間的動態關係。以世代視野觀之，陳蕙貞與文心同為日治時代昭和期台灣日本語世代作家，在戰爭中度过其青春期的關鍵階段，具有相似的生命經驗。而其《漂浪的小羊》與《泥路》同以兒少視角的感受思維、家的離返之敘事路徑和語言句式，重新詮釋和表現戰爭生活，進而刻劃戰時壓抑又亟欲建構主體的社會圖像與時代記憶。研究步驟上，第二章先由二作所述之殖民國與被殖民地的兒少戰時疏散生活論起，梳理人物心理的成長變化與戰爭日常敘事；再者，討論《漂浪的小羊》和《泥路》以女性為敘事中心的家族書寫，勾勒戰時離散敘事的我群形塑與移動情境。透過兩人戰爭書寫的敘事視域，一則由兒少的特殊角度表現被殖民者台人的戰時離散之抑鬱境遇，一則顯現終戰後台人對戰爭記憶的歷史詮釋與修復心理。

第二部「復員重啟與社會內戰」包括第三、四章，同樣以1945年戰爭終結前後的台人境遇為觀察範疇，拉進中國的地緣文化因素，分別由

台人社群刊物與個別作家的角度出發。第三章為針對台灣省旅平同鄉會1946年出版之機關誌《新臺灣》文學文本，論述「性別」敘事話語與戰後初期國族敘事的權力結構關係，揭示台灣人對己身邊緣主體的正名追求；第四章則鎖定台人作家張我軍終戰前後至返台後一九五〇年代間的書寫，藉其歸返前後的論述與創作，闡釋終戰後旅中台人的原鄉圖景與內戰記憶、認同之關係。社會內戰是第二部的關鍵概念，第三、四章的研究對象則糾葛於日中／中日戰爭遺緒下國族身分轉換的思辨。

第三章〈擬聲政治：論戰後初期《新臺灣》雜誌的女性修辭〉，立論於一個熟知的歷史敘事：1945年是自由世界戰勝軍國主義的時點，對台灣而言則是脫離日本殖民統治後，境內的多元住民速求「國民化」(nationalization)的歷史階段；然而國民統合的過程在戰後初期即遭挫敗。加諸國家、國族認同建構的過程中向來指涉了明確的性別關係，此章結合此一殊異的歷史背景及認同建構概念為出發點，由雜誌《新臺灣》國族主義的男性話語空間中的女性修辭，探求戰後初期旅居北京的台灣知識分子的文化論述與家國想像。首先，整理1946年創刊於北京的《新臺灣》雜誌之緣起與內容議題，詮釋戰後初期台人言論刊物蜂起的歷史脈絡；再者，由《新臺灣》的性別比喻與女聲敘事的相關文本，剖析日治時期即置身中國的前殖民地台灣知識分子，戰後對於原鄉中國與故鄉台灣的發言姿態及身分思考。第三章透過《新臺灣》文學文本與報導論述中的女性修辭，意求呈現戰後初期台人追求國民化過程中身分認同與性別話語的政治操作，擬女聲的情感性敘事正表現了台灣人邊緣他者的自覺性，以及主體性追求的強烈企盼。

第四章〈島嶼的離返：戰後張我軍的歸返敘事與北京再現〉是作家專論，張我軍(1902-1955)從日治至戰後活躍於台灣、中國兩地，其書寫呈現了殖民地青年的文化視域與中國觀察。終戰後他不僅積極參與台灣省旅平同鄉會，1946年更返台就職台灣省教育會。戰後張我軍的書寫類別分為時論和散文隨筆，前者為關於政府政策的論述，後者為描繪台灣風物的遊記、散文，內容穿插戰前中國經驗的參照，包含對台灣

現狀的失落與北京舊時生活的回味。張我軍的戰後文本可謂解讀戰時中國、戰後台灣與離散台灣知識分子狀況的重要資料。由生命經歷、文本題材、創作時點等角度，皆顯示張我軍書寫之於跨越 1945 年台人生命史的考察意義。論述架構上，首先以終戰後張我軍台灣同鄉會活動為軸線，進行中國經驗與戰後時論之研討，呈現戰後初期作家置身中國的活動狀況與文化思考；再者，爬梳張我軍對戰後台灣社會樣態的觀察書寫，尤其是空間移動和記憶再現的感知互涉。第四章由張我軍戰後書寫的全盤考察，析論其歸返前後所建構的台灣圖景與記憶、認同之關係，掌握跨域台灣知識分子作為政治遺民的敘事模式與精神疏離。

**第三部「島外台人的述史敘事」**包括第五、六章，此部將研究視域移至島嶼之外的台灣知識分子柯政和、張光直，呈現兩人告別和再現島嶼的殊異敘事取向。於台灣場域匿跡的旅中音樂家柯政和，歷經殖民地台灣、軍閥中國、日本勢力範圍的生活更迭，一九四〇年代由音樂教育跨足民族文化歷史的論述，呈現台人戰時的中國視域與文化觀察。旅美多年的人類學家張光直則在戰爭之後逼視自我生命史的台灣經驗，以回憶錄和小說收束遭受國家暴力的受難者集體創傷，批判戰後社會國族建構的政治暴力。音樂家柯政和、人類學家張光直成為傳遞過往歷史經驗的書寫者，第三部的討論顯現台人感於時局向公眾發話的述史趨向。

第五章〈漂泊者的中國風景：台人音樂家柯政和戰前（1922-1945）在北京的社會觀察與書寫〉以台籍音樂教育家柯政和（1889-1979）為研究個案，他一生流離於台灣、日本、北京，對中國近代音樂教育貢獻良多，尤其活躍於一九二〇年代以降至終戰的北京文化界。作為近代音樂教育開創者的柯政和，卻鮮於台灣文史研究中受到討論，此緣於資料相對偏少外，尚有其活動空間主要在中國且戰後未曾返台，以及任教於日本勢力下戰時北京校院等因素使然；然而，就戰前台人東亞移動、戰爭期北京文化網絡，以及台人海外社群研究而言，柯政和是不可忽視的存在。基此，第五章以柯政和戰前文化活動為考察，探究其於台灣、中國不同歷史階段的形象建構與人際往來，以及文化史日文專論《中國人的

生活風景》(《中國人の生活風景》)、《中國的社會風景》(《中國の社會風景》)之中國敘事。藉此呈現戰前島外離散台人的形象演繹與戰時文化視域，掌握大東亞決戰下旅居北京台人的漂泊主體樣貌與歷史書寫意識。

第六章〈歷史記憶與創傷書寫：論張光直《蕃薯人的故事》及其一九八〇年代小說的再現機制〉，張光直(1931-2001)為知名考古人類學家，也是本書第四章研究對象台灣新文學運動先驅張我軍之子。1946年底他由北京返台，因「四六事件」牽連而入獄，獲釋後立志投身人類學研究，赴美深造。戰後初期張光直曾於《新生報》發表數篇創作，直至一九八〇年代以「吳襄」為筆名於海外發表小說，並著有回憶錄《蕃薯人的故事》，敘述早年生活回憶及四六事件入獄過程，補述了戰後台灣歷史的特殊階段。其戰後創作刻劃了戰時北京至戰後初期台灣的個人生命史，交織另面的時代紀錄與創傷記憶。此章以張光直的回憶錄《蕃薯人的故事》及其一九八〇年代小說為討論核心，輔以戰後初期作家的的小說與雜文，呈現流離於中國、台灣、美國三地的台灣知識分子之歷史記憶與創傷書寫。結構上，首先整理戰後初期社會狀態與張光直的生命經歷，次節析論《蕃薯人的故事》關於戰時北京與戰後台灣戒嚴前的記述，包括戰時生活、二二八與四六事件的創傷經驗；再者，以一九八〇年代小說對比作家回憶錄，剖析生命記憶與文學再現間的互文重編，思索創傷書寫如何挪轉為有意義的文化批判和自我療癒。藉由張光直的書寫不僅得以銜接斷裂的國族歷史，且能掌握戰後世代台人的心靈圖像，而具反思台灣社會記憶的意義。

結論回顧本書問題意識，闡明戰爭作動下台人的身分移轉、記憶浮動、敘事編組，梳理近百年來島嶼台灣所產出的離返故事和文化記憶。本書以戰時記憶敘事的文學文本為研究主軸，整合三大主題共六章專論，總結「戰爭之框」論述下身分與記憶如何引導台灣文學書寫，析理日治末葉帝國時期乃至一九九〇年代台灣社會在文學中的多重戰爭軌跡和書寫識框。「人」是戰爭永恆的主題，文學文本的思想討論則不能脫

離社會結構，方能掌握歷史進程與生活經驗之間人的情感、心態、記憶與意識變化。本書的研究目的是藉由文學文本的文化敘事尋找戰爭記憶裡的台灣身影，呈示各種述說島嶼戰爭的方式，處理戰爭遺緒與國族身分的千絲萬縷，盼能產生補綴之效。掌握台人不同世代面對戰爭的時代姿態與應對之道，不僅有助於擴展台灣文學論述的疆界，成為想像世界的一份子。更重要的是，唯有重現對國家暴力、戰爭災難與生命創傷的記憶，反思及解構不平等統治的關係力場，社會方有可能達到真正的和解之境。